

郑观应新闻思想述评

孙振斌

1840年，帝国主义的大炮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伴随着列强在中国攫取的政治、经济、军事等特权，由外国商人、传教士主办的报刊也开始在大陆上陆续问世了。到十九世纪末叶，总计有170种左右，大约占当时中国报刊总数的65%以上。这些报刊作为文化侵略的工具，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保卫外国在中华所有之政治商务利益，并抵拒华人之舆论”（参见方汉奇等著：《中国新闻事业简史》第1章第2节），因此激起了许多爱国人士上的强烈愤慨。他们一方面指责外报“黑白混淆，是非颠倒”（王韬：《弢园尺牍·与方照轩军门》），“诋毁当轴，蛊惑民心”（郑观应：《盛世危言·日报》）；另一方面主张华人自己办报，以免“坐使敌国怀觊觎之志，外人操笔削之权”（同上）。其中尤其引人注目的一个人，就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经营家和改良思想家郑观应。

郑观应，广东香山 人，生于1842年，卒于1922年。他从17岁到上海学商开始，先后在一些外商兴办和官督商办的企业里担任高级买办或帮办。在数十年的贸易经营生涯中，郑观应痛切体会到列强的凌辱和民族的危难，通过对西方社会的考查及本国情势的探究，提出了一系列变法自强的主张。曾

经轰动一时的《盛世危言》，可以说是他改良思想的集中体现。在这本书里，有两篇论述“日报”的文章，虽然篇幅不长，但是对报纸的性质、作用和办报的原则等问题，均有深刻的阐发，充分表达了他的新闻观。本文拟对此作一初步述评。

二

在《盛世危言后编·自序》中，郑观应概括地表述了他的改良思想体系：“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可见，作为实业经营家的郑观应，并没有走单纯的实业救国道路，而是把政治改良放在变法自强的首要地位。从这一目的出发，他明确地提出：“今如欲变法自强，宜令国中各省、各府、各州、县俱设报馆”（《盛世危言·日报》）。以下凡引自同篇的引文不再注明出处）。人们也许会问，变法自强和设报馆有什么必然联系，郑观应为何要把设报馆当作一个救国方策郑重提出来呢？这个问题实质上涉及到对当时国势和报纸性质的理解。

郑观应认为，中国之所以“民困不能苏，国威不能振”（《盛世危言·议院下》附录“议院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上下之情隔焉故也”（同上）。“在上者既以事权有属，法令在所必行；在下者亦以势

位悬殊，情隐不能相告。于是利于上者，则不利于下矣；便于下者，则不利于上矣。”

（《易言·论议政》统治者不掌握民情，老百姓不了解政事，这种状态非但不能使民众享受民主权利，而且也不利于当政者有效治理。在他看来，“上下交则为泰，不交则为否。……伊古以来，盛衰治乱之机总此矣”（《盛世危言·议院上》）。既然历史经验已经证明沟通上下之情实为治国安邦的必由之路，既然当时中国已经产生言路堵塞，上下相隔的弊病，那么，变法自强的必然逻辑就是“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同上）。怎样才能通下情呢？郑观应提出两条措施，一是建立议院，二是广设日报。

郑观应指出：“日报者，即古乡校之遗意，今西国议院之滥觞，为公是公非之所系，众好众恶之所彰。”他引用西方事例说，“凡献替之谏，兴革之事，其君相举动之是非，议员辩论之高下，内外工商之衰旺，悉听报馆照录登报。”故此日报盛行而“民心无不惬，民志无不伸也”。很明显，在郑观应的心目中，报纸应该是表达民意的论坛，沟通上下的渠道。因为，无论是中国的乡校，抑或是西方的议院，其功用都包括“通民情”、“广言路”。正是在这一点上，它们便和报纸取得了内在的一致性。而报纸对君相举动的披露，对议员辩论的报道，恰恰又使上下之情得到及时的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双方的对立性和各自的盲目性。

一般说来，在封建社会里上层统治者的指令可以通过庞大的官僚体系以多种渠道向下灌输，而普通民众的意愿却难以得到全面、正确、及时的反映。这样就很容易出现马克思当年指出的那种情况，即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可它却欺骗自己，以为听见了人民的声音（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6页）。但是，由于近代报纸的产生和发展，由于一些报纸不仅注意刊载来自上

层的消息，而且重视表达来自下层的呼声，于是报纸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沟通上下的渠道，从而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这正是郑观应把广设日报与变法自强联系在一起的根本原因。

三

郑观应是从上层建筑改良的角度来讨论报刊的。但是与此同时，他也敏锐地看出了报纸对社会现实、民众素质的广泛影响。由于他主张报纸对“凡有益于国计民生、日用行为、性命身心者，则无不录，录无不详”，因此认为“报馆之设其益甚多。约而举之，厥有数事”：

一、“足不逾户庭而周知天下之事”。

中国有句俗话，“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这里的“天下事”用来指谓历史之事，尚近乎情理，用来称代当今之事，则不免虚夸。然而随着近代报纸的问世，举凡“官家之颞笑，京国之传闻，各国之约章，列邦之强弱，战守之情形，时务之缓急，物料之价值，市道之衰旺……”如此等等，直至“异邦之习尚，海外之奇谈，天气之寒暑，风汛之休咎”，统统挫于报端。自此，人们真正做到了“足不逾户庭而周知天下之事”。不要低估了报纸披露天下事对个体、对社会、最终对历史发展所具有的重大作用。即使在闭关自守的宗法社会里，无论君子贤人亦或市民农夫，都以耳聪目明，通达世事为荣。与其说这是追求功德炫耀智慧的巧饰，不如说是保证生存、改善处境的本能。只可惜由于经济落后、交通阻隔、思想禁锢而难以真正实现。进入十九世纪，社会局势的动荡不宁，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东西列强的坚船利炮，愈发明显地暴露出对天下事道理上应多知、快知、深知与事实上却不知或知之甚少的矛盾，其结果必然是有害于“国计、民情、边防、商务。”这恰好从反面证明了郑观应对报纸作用的判断。

二、“增人智慧、益人聪明”。报纸的这种益处，是报纸披露天下事的社会作用内化于个体心智的结果。勿庸置疑，人的聪明来自于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人的智慧往往体现了以经验为基础做出的超前反映。但是，受环境、身份、文化等条件的限制，每个人不可能对各种事物都有亲身体验，从而也就影响了人们聪明智慧的生发。在郑观应看来，报纸之所以能“增人智慧、益人聪明”，其根由在于：甲、内容丰赡。“凡有益于国计民生、日用行为、性命身心者，则无不录，录无不详。”一报在手，可将人生世事尽收眼底。乙、文义浅近。不象那种高头讲章，让人望而却步。报纸有广泛的读者面，可使雅俗共赏，“盖新闻者浅近之文也。”丙、种类攸分。“如律家有律报，医家有医报，士农工商亦各有报”。这样可以满足不同读者的需要，以至“官绅士庶、军士工役之流莫不家置一编，以广见闻而资考证。”丁、“逐日阅之，殊不费时，随事求之，必有新获”。报纸以生动的事件描述，代替抽象的事理阐发，读者在消遣式的阅读中，得到教益。我们以今天的报纸来校验上述见解，仍然感到郑观应的分析是精细、恰切的，且无过时之嫌。

三、“明义理以伸公论”。郑观应深谙报纸对开明政治的形成、社会风气的改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他认为报纸销路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闻见多而议论正，得失著而褒贬严”，这些正是报纸作为一种社会舆论工具的基本特征。有了报纸，“凡献替之谏，兴革之事”，“君相举动之是非，议员辩论之高下”，都将揭去其神秘的帷幕，而公之于天下，使民众能褒贬世事、监督政府，与当政者站到了平等的地位上，“是以暴君污吏必深恨日报”。有了报纸，“人才之盛衰，风俗之纯疵”，“高人之片词只字，愚妄之荡检败行”，也都会历历详述，足以寓劝惩，而昭于世人，“俾阅者快焉劝

焉”，“一切不法之徒，亦不敢肆行无忌矣”。但是在缺少报纸的封建社会里，公正的舆论是很难形成的。即使形成了，也很难迅速在全社会产生影响。因为统治者总是处心积虑地用自己的意志去取代民众的意志，不择手段地利用权力去防民之口，这就无法做到“明义理以伸公论”。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利用报纸争取政治权力并且取得成功的先例，给郑观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由此引发他对报纸基本性质的理解。

四、扩民之识见，高民之志量。报道新闻、反映舆论是近代报纸的两大功用，也是研究报纸的近代学者所一致公认的。如果说郑观应的理论有独到之处的话，那么，这并不表现为他对前述两大功用的论证，而是反映在他对报纸有助于改造国民性格、社会心理的洞察。他指出，由于“中国泥守古法，多所忌讳”，以致产生了两种相反相成的弊习。其一是“徇情面，行报复，深文曲笔，以逞其私图”。其二是“唯诺成风，噤嘴不出，知而不言，隐而不发”。有此弊习，“故中原利益无自而开，即民情亦不能上达，告谕亦不得周知”。联系中国封建社会长久延续的原因，以及回顾“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国民魂灵的反省，我们不能不承认郑观应对民族心理的解剖是入木三分的，而他能够从改造民族心理的角度去研究报纸更是难能可贵的。显然，在郑观应看来，由于报纸可以沟通上下之情，那种“知而不言，隐而不发”的唯诺之风便会受到严重冲击；而通过报纸去明义理、伸公论，也将使那种借“深文曲笔以逞其私图”的陋习得到社会谴责。他乐观地认为：“若报纸一行，则民之识见必扩，民之志量必高，以此愈进愈深，愈求愈上，吾知其正无止境也。”

四

依照郑观应的观点，报纸作为通民隐的捷径，伸公论的利器，开民智的法宝，理所

当然会大大推动变法自强的政治改良，因而有必要在全国大力“倡办以开风气”。但是，在当时要实现这一主张，必须设法排除来自多方面的障碍，其中包括：一、本土的外报为列强张目，混淆视听，甚而“颠倒是非，任意毁谤”。这不但会损伤中国的利益，而且也影响了报纸本应遵循的公正原则。二、本国的当道者因噎废食，以报纸的徇私失实现象为理由，压制乃至禁止报业的发展，从而势必要严重影响政治的改良。有鉴于此，郑观应提出了报纸的自律和他律问题。

首先，在报纸一方，为了充分发挥自身积极的社会作用，“上则裨于军国，下则益于编氓”，必须自觉恪守报业的基本法则。

在郑观应看来，这种法则最根本的内容至少包括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第一，办报人或执笔者应当“毫无私曲，暗托者则婉谢之，纳贿者则峻拒之。胸中不染一尘，惟澄观天下之得失是非，自抒伟论”。很明显，如果做不到毫无私曲，而是“徇私受贿，颠倒是非”，那么报纸就将丧失其明义理，伸公论的社会功能，蜕变成泄私愤，图私利的个人工具。在这里，郑观应的用意绝不仅仅是强调职业道德，而是企图通过职业道德的范围，使报纸保持作为一种舆论力量的独立地位。尽管报纸在任何时代都不可能不受社会状况的制约，甚至要依附于一定的阶级或集团，但它毕竟不是某一个人的传声筒，更不能在重大社会问题面前保持沉默或人云亦云，而必须做出自己的判断，提出自己的见解，即“澄观天下，自抒伟论”，这样才能发挥扬善抑恶、引导民心的作用。而欲保持独立地位，赢得社会信任，就必须“毫无私曲”、“不染一尘”。第二，办报人或执笔者应当“据事直书，实事求是，而曲直自分，是非自见，必无妄言谰语、子虚乌有之谈，以参错其间，然后民信不疑”。这可以看作是郑观应有关新闻真实性原则的见解。把实事求是、绝不掺假作为报纸最突出的品

格，这种见解在许多新闻学论著中都能看到。值得注意的是，郑观应坚持讲求通过据事直书、实事求是，而自然地收到“曲直自分是非自见”的效果，这就不仅暗含着他对报纸的陈述与议论应有所区别的看法，而且渗透了他尊重读者判断能力的意向。经验告诉我们，在报道中如果掺杂了不适当的议论，不但有可能以倾向性损害了真实性，而且还可能引起读者的逆反心理。因此高明的笔法并不是以直露的事实评判去海喻读者，而是以巧妙的事实剪裁去暗示读者。在据事直书的过程中，让曲直是非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

在郑观应心里，报纸的作用在于影响社会，报纸的根基在于取信于民。两相比较，后者更为重要。因为，只有取信于民，才能影响社会。而要取信于民，必须尊重事实、尊重民众，不能违反出以公心、事实求是的法则，报纸只有以这一法则来自律，才能生存发展，推动改良。

其次，在社会一方，为了切实保障报纸的合法权益及健康发展，必须颁行报律，“俾官商各有所遵守”。

郑观应明确地指出，由于“中国现无报律”，加上“报馆主笔良莠不一”，因此难以防止下述两种现象的产生。一方面，大、小官员“恃势恫喝，闭塞言路”，或因其过失见诸报端而与报馆为难，或“无端诋毁勒索钱财”，甚至“偶摘细故，无端封禁”，另一方面，报人、主笔倚仗报纸之便，“借公事以报私仇，籍巧词以纾积忿”，“逞坚白异同之辩，乱断民之视听”。郑观应的这些分析绝非捕风捉影。综观世界报业发展的历史，上述两种现象，尤其是前者几乎在每个国家都是一种不能否认的事实。一般说来，报纸的产生与发展，民意的表达与伸张，总要形成对反动专制、腐败愚昧势力的冲击，这在社会大振荡时尤其显著，故而不可避免地会触动那些专营私利的官僚们的切

身利益，以致他们处心积虑地企图使报纸夭折或就范。而某些报人违背职业道德的举动，又往往授人以柄，从内部损害了报纸应有的信誉和作用。根据国外的经验，郑观应提出，应参照外国报律，选定、颁行本国的报律，使国人据此“广设日报”，使官吏据此“设法保护”。在他看来，“国无大小非法不立”（《盛世危言·公法》），是非曲直援法而明，而法的本义恰如刘熙《释名》所言：“法，逼也。人莫不欲从其志，逼，正使有所限也”。凭借这种君临于个人意志之上的行为准则和强制力量，既可以保护报纸的盛行和公论的张扬，又能够限制无理的刁难和恶意的中伤。一旦发生官吏“恃势恫喝”、报纸“伤人名节”的事件，便可以依法惩治。

由此可见，报纸的自律和他律对于报纸的发展来说，如鸟之双翼，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没有自律，报纸就缺少立命安身之本，从而无法在变法自强中发挥重大作用；而没有他律，报纸就难以抵挡内痛外患之苦，继而可能最终断送报纸的前程。郑观应新闻观的深刻之处，正在于他不但扼要地阐发了报纸的性质和功能，而且清醒地指明了保证报纸正常发展的关键。特别是他对颁行报律的重视，更显出他的锐敏。因为，读者的冷淡，固然可以充当针砭缺少自律的报纸的良药，而读者的拥戴却不能替代保护没有他律的报纸的灵符。

五

从篇幅上看，郑观应关于报纸的论述，在他全部著作当中所占比重并不是道。然而从质量上看，其观点之犀利，论证之精细，分析之全面，不仅在当时具有标新立异之功，即使在今天也不失启人心智之用。那么，他的报纸研究何以能取得非同凡响的效果，他的新闻思想又有哪些值得重视的特点呢？

第一，以推动改良为论报的基点，从变法自强的角度去分析报纸的功用。

鸦片战争以后，许多爱国志士都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具有几千年文明的泱泱大国何以会遭受在许多方面都不如自己的西方小国的凌辱呢？由此便引起了一种意义深远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这种研究可以说是中国人对自己民族特点和历史传统的反思。郑观应作为研究初期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与先行者魏源、同代人王韬一样，把比较的目光投向了中西政体的差异，认为国家的强弱取决于政治制度，而西方政治之所以优于中国，原因之一是“日报盛行”。通过日报，议政者请“议员之优劣，政事之从违”，柄政者能“劝善惩恶，兴利除弊”，如此“上则裨于军国，下则益于编氓”，遂使日报成为西方各国“民政之枢纽”。平心而论，郑观应的见解不无理想化的色彩，但他确实揭示了报纸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历史发展中可能及已经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他透过纷纭斑驳的新闻现象，直接切入对报纸政治功用的阐发。

回顾新闻学发展的历程，就主流而言，大体上经历了这样四个阶段，首先，为寻求变法自强的方策，论者们有感于西方资产阶级的经验，于是直接将讨论的重点集中在报纸与政治改良、社会变动的关系上。这个阶段的成果在于深刻揭示了报纸的基本性质和功用，但是这种讨论只是作为政治学的一个附属课题，而不是独立的、自觉的新闻学研究。其次，与报业的迅速发展相适应，论者们把报道看作一种需经特殊训练才能胜任的职业，于是便把探寻的重点放置在诸如采访、编辑、经营一类技术问题上，试图编制出各道工序的流程图及各个环节的实施细则。这个阶段的成果在于从科学的田野上开出了一片新领地，然而它的理论基础实在薄弱，以致显得“工匠”意味过于浓重。再次，随着新闻媒介社会影响的愈发显赫，论

者们产生了“新闻现象可以作为一种自在本体来看待”的意识，于是求索的重点便转移到历史演变、内部规律、因素结构等课题上。这个阶段的成果在于描出了新闻学的轮廓，可惜往往由于它的顾影自怜，而失之浮浅。第四，在科学高度分化、高度综合的背景上，论者们开始走出自我封闭的禁地，于是研讨的重点逐渐深入新闻媒介与政治变迁、社会心理、文化传统的相互影响的问题上。从此，人们对新闻现象的认识才进入了深层结构。郑观应不象近代许多思想家那样有过办报的亲身经验，“也不曾以研讨新闻学理论为专业，但这不仅不妨碍他从更高的层次去透视报纸的意义，而且也使他避免了后来新闻学研究过细过窄的局限。

第二，以民众意愿为论报的准绳，从沟通上下的角度去考察报纸的性质。

在涉及中国报刊史时，许多论著都把汉、唐邸报当作中国新闻业的滥觞。如果此论成立，那么，汉唐以降直至晚清，这类报纸代代相递与世推移，完全称得上源远流长。既然如此，郑观应为什么还要大声疾呼“广设日报”呢？我们认为，首要根源在于，郑观应对报纸宗旨、性质、作用，以及衡量报纸的标准，有他自己的主张。众所周知，邸报发展到近代，已经具备了活字印刷、定期出版、公开发行，以及正规的编辑、经营组织等形式特征，但所刊内容大体上一如既往，仍以谕旨、奏摺、法制章程为主。这种报纸带有彻头彻尾的官方色彩——由官方来辩理，表达官方的意志，供上至君臣、下至村长的整个官僚体系阅读，以维持封建帝国机器的正常运转为最终目的。总之，一切对统治者说来应该想的、做的、看的，邸报上都不缺少，唯独缺少的就是由民众自己来表达的民言、民意、民情。这就进一步扩大了上下之间业已存在的巨大差距。郑观应深切意识到上下之隔对政治改良、社会昌明的危害，但他没有用激烈的言

词去抨击邸报的弊端，而是直接论述了报纸通达民意对社会稳定和强盛的重大作用。他认为：“古之时，谤有木，谏有鼓，善有旌，太史采风，行人问俗”，所有这一切的根本目的就在于“通民隐、达民情”。果真做到这一点，“则国势之隆无不蒸蒸日上”。作为历史的借鉴，他把秦王朝覆灭的原因归结于“焚书坑儒以愚黔首，欲笼天下于智取术驭，刑驱势迫之中”，言路不达，民情难通。而唐、宋两代虽“始设给谏，待御诸言官以防壅蔽，而清议始彰。然以云民隐悉通，民情悉达，则犹未也”。那么，怎样才能做到通达民情呢？他的答案是“莫如广设日报矣”。在郑观应的表述里，有一个明确的三段论：大前提——欲要国家强盛，必须通民隐，达民情；小前提——日报可以通达民隐民情；结论——广设日报有助于国家强盛。

从这个三段论中，我们可以获得如下印象，即在郑观应心里，言路与民情的通达是变法自强的一大要务，报纸的性质与功能也恰好从这里得到体现，而那些不表达民意的出版物，是不在报纸范畴之内的。如果援世界范围内报纸的起源和现状加以印证，这应该是不易之言。

第三，以中西对比为论报的方法，从洋为中用的角度去研究报纸的特征。

郑观应是一个爱国主义者，面对列强的欺凌、民族的危难，他愤慨之极达到了“眦裂”（《易言·自序》）的程度。他在一首诗中写道“群雄各覬觐，利权暗侵夺。……虎视并狼吞，海疆终决裂。奋笔作此诗，字字含泪血。”（《“诗草”卷一·谈时事》）为使中国“登于富强之境”，郑观应“初则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彼外人商战”。（《盛世危言·后编》）同时著书立说，寻求救国方策。《盛世危言》就是他几十年实践经验的总结，“大量著述的思想结晶”（夏东元：《郑观应传》）。该书不仅“于中西利

弊透辟无遗，皆可施诸实事”（邓华熙：《上光绪帝荐疏》），而且处处扬溢御侮之志、爱国之情。今天读来仍不乏感人肺腑的力量。但郑观应绝不是一个以中央帝国之尊，把外国的一切都贬得分文不值的爱国者，他始终坚持客观分析，师其所长，为我所用的原则。

郑观应对报纸的分析，十分清楚地体现了上述原则。例如，他从报纸已经成为“泰西民政之枢纽”的现实，悟出了报纸作为通民隐、达民情之工具的基本性质；从报纸在西方社会发挥的多种作用，看出了报纸在变法自强中的重要功能；从西方报纸盛行的实际经验，提出了中国发展报纸的必要途径；从列强利用报纸进行文化侵略、混淆视听的行径中，指出了报纸在外交斗争中的特殊地位，等等。可以认为，没有对外国报纸的研究和借鉴，郑观应就不可能形成自己的新闻观，进而也就不可能对中国新闻事业和新闻理论的发展产生影响。进一步说，促使郑观应从中西比较、洋为中用的角度去研究报纸的原因，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来自变法自强的策略思想。他认为，“夫欲制胜于人者，必尽知其成法，而后能变通，能变通而后能克敌”（《易言·西学》）。因此之故，他才“学西文，涉重洋，日与彼都人士交接，察其习尚，访其政教，考其风俗利弊得失盛衰之由”（《盛世危言·自序》）。广设日报的倡议，正是考察、借鉴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则来自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他既反对“震惊他人之强盛，而推崇过当”（《盛世危言·西学》），也驳斥那些“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曰名教罪人，士林败类”的“自命正人者”（同上），在他看来，“夫地球圆体，既无东西，何有中边。同居覆载之中，奚必强分夷夏”（《易言·论公法》）。故而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博古通今，审时度势。不薄待他人，亦不至震慑他人；不务匿己长，亦不敢回护己短”

（《盛世危言·西学》）。必如此，方能“建非常之业，为非常之人”（同上）。正因为有这种态度，郑观应才提出了不少切中肯綮的论断。

六

王韬曾经评价说，郑观应“所欲变者器也，而非道也”。（《易言·跋》）此话确实道出了郑观应整个思想体系的基本特征。这一特征显然限制了他对报纸更广泛、更深刻的考察。例如，他企图通过广设日报来推行民主。但是，封建王朝的本性之一，恰好就是以压制民意来维护其独裁专制的。实际上，不推翻封建统治，言路就不能畅通，日报也难以盛行。再如，世界新闻发展史已经说明，不同国家的不同政治制度会给报纸的命运带来不同影响，同一国家不同阶级力量的对比也使报纸的性能产生分化。而他正是强调报纸在社会生活中的独立地位，却忽视了政治形势对报纸的制约作用。这些问题都反映出郑观应新闻观的局限性。当然，这也未必不是时代的局限性，因为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从这种意义上说，由于郑观应紧紧扣住通言路、达民情的主题来论报，就使他的新闻思想体现出当时的社会发展趋向和学术研究水平。从他的论述里，我们意识到，尽管新闻学在中国被当作一个正规的学科来研究，只是“五四”运动以后才开始的，但是其思想源头至迟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中叶。以郑观应为代表，包括洪仁轩、王韬、梁启超、谭嗣同、严复、蔡元培、孙中山等风云人物，都曾发表过许多关于报纸的精彩论述，其中不少人还直接参与了办报活动。他们的思想和实践是中国新闻事业和新闻学术的一笔遗产。认真发掘、整理这笔遗产，大力开展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的研究，一定能使我国的新闻学更丰富、更科学。这也许是郑观应新闻思想带给我们的又一启示吧。